

目 录

瑞安学计馆史料辑要.....	杨作雨 (1)
解放前的瑞安中学.....	王超六 (4)
抗战期间求学瑞中的回忆.....	蔡瑞庭 (14)
太平军进军瑞安史略.....	俞天舒 (16)
辛亥革命前夕的瑞安农民暴动.....	许希濂 (20)
瑞安港口通航史话.....	曹敬容 (21)
抗日战争前瑞安海运史话.....	张树汉 (25)
浅谈温州(瑞安)鼓词的渊源和发展.....	宋维远 (28)
李雁晴君小传.....	陈中凡 (34)
八憨老人——我的祖父.....	吴 亮 (35)
俞春如先生事略.....	许世铮 (37)
发扬整个社会尊师的优良传统.....	林炜然 (38)
光绪乙巳抵制美货传单跋尾.....	炜 然 (41)

封 二 张之洞题学计馆匾额

孙锵鸣照片及说明

封 三 抵制美货传单

瑞安学计馆史料辑要

杨作雨

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

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六日（清光绪廿二年丙申三月初三），瑞安学计馆成立，即日开学。

还在上一个世纪九十年代，又在偏僻的浙南小县城，由民间发起并集资，办起了这样一所新式的算学专门学校，即从全国范围来论，也是颇为大胆的尝试。

学计馆的概况，已被编入《中国近代教育史大事记》（上海教育出版社编印）

创办学计馆的历史背景

与任何事物一样，学计馆的诞生，决非偶然。

创办的前二年，发生了“日本以蕞尔岛国，战而胜我，奇耻大辱，莫甚于此”的甲午战争。群情激愤。一切有识之士，也因此从沉酣已久的“洋务”迷梦中惊醒，群起探求新的自强自救之道。而当时所能找到的，也只是“变法图存”的改良主义道路。创办后二年所发生而短命的戊戌变法（百日维新），便是这种探求的一个历史苦果。在此前后，一种似可称之为“教育救国”的思潮，在逐渐形成，并不断扩大影响，成为以“中体西用”为根本原则，以“变科举，兴学校”为主要途径的改良主义教育的思想基础。在教育的各门学科中，算学一门受到特别的重视。早在六十年代提出的“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”（汪桂芬）之说，被更多的人所接受。一八九一年，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封疆大臣的身份，在武昌办起了一所专门的算学学堂。一八九五年，维新派骨干人物谭嗣同的《论兴算学书》，传诵一时。《梅氏筹算》、《平三角举要》等中算专著及外国传教士编译的《形学备旨》、《代数备旨》等西算教科书，大量出版。学计馆就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诞生。学计馆主要创办人孙诒让，正由于甲午战败的巨大刺激和“教育救国”思潮的强烈影响，挺身而出，从“乾乾治经生之业”的一代经师，转变为以“努力开拓新世界”为己任的乡里教育事业家。孙氏在温、处两地，亲手擘划和筹办的各级各类学校，多达三百余所。学计馆的创立，是孙氏这一转变的标志。当时孙氏已年近知命，尤为难能可贵。

学计馆的办学始末

一八九五年冬（阴历十月间），孙诒让牵头，其它发起人黄绍箕（仲弢）、黄绍第（叔纘）、项崧（申甫）、周拱藻（仲龙）、洪锦标（叔琳）、王恩植（雪璞）、鲍锦江（稚琴）、杨世环（小村）全体参加的第一次筹备会议，在小东门外话桑楼召开。会议决定：一、由九位发起人共同负责筹备工作；二、试办瑞安算学书院，兼教中西算学；三、先由民间集资创立，然后请拨官款。筹备会议开了“不止二、三次”，“讨论之余，兼以觞咏，晨聚夕散”，地点都在话桑楼。

筹议既定，便由九位发起人联名，向温州府及瑞安县官署申请立案。下面是立案稟文的摘录：

算书义理精奥，非得良师教授，索居冥搜事倍功半；……诸学徒务期志趣远大，不域于小就，由是而格致之理，制器尚象之法，兼综条贯，因材施教，数年之后，必有瑰异者出乎其间。

——摘自《孙诒让年谱》（孙孟晋编，复印本，瑞安文物馆收藏）

这里有个值得注意的观点，用现代话来说，就是：算学是通向各门自然科学的必经之途。后来，孙诒让在《瑞安新开学计馆序》中，说得更加明白：“专治算学，以为致用之本。”更何况，“算学为古圣人六艺之一”，与当时所揭橥的“中体西用”的原则，又完全一致。创办人之所以办了专治算学的学计馆，而不办其它类型的学校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经官署批准立案后，订立了《章程》十六条、《学规》二十六条、《大课规程》十则，均由孙诒让起草，集体讨论决定。《学规》有这样一条：“学徒除习算外，如中外交涉事务，本国及外国时事记载及近时西人所著格致诸书，每日择简明切要者讲示若干条，以广见闻，而俾实用。一扫旧式书院、“不问窗外事，只读圣贤书”的陈规旧习，这在当时当地，未尝不是一个创举。

学计馆的经费来源，开头全在于当地民间（包括绅商各界及地方官个人）。凡官场人士，由孙诒让出面劝募；绅商各界，则由其它发起人分头募捐。到一八九五年底，共募得捐款一千五百零六元。开办费用去五百元，余数概作学校基金，存典取息，维持日常开销。立案稟文提及的“经费未充”，当是事实。“讲堂凳桌，均借自文场士子就试所用的长板凳桌”，筚路蓝缕，于此可见一端。后来，因原有基金已动用过半，当地又无法续募，只得由黄绍箕、黄绍第出面，请拨官款，后拨到二千元；孙诒让再向外地人士多方劝募，也募到一千三百多元；加上孙氏本人乐助二百多元，连同原有基金余额，勉强凑成四千元，作为日后的办学基金。

当时，瑞安城区有座卓公祠（现党校校舍）地点适中。卓公是乡先贤卓敬的尊称，他不仅是明代名臣，而且研治算学。后人利用这座祠堂办学计馆，便寓有“袭先儒稽香之义”。卓公祠经过改建，面目一新，内设会堂、教室、操场、自修室、阅览室等教学设施，粗具新式学校的规模。

关于校名，初拟算学书院。而筹办结果，无论教学内容或教学设施，都和旧式书院大不相同；且北京已办起天文算学馆，广州也办了实学馆，性质相仿。于是便有正名之议，并一致认为易名学计馆为好。学计馆的匾额，是张之洞手迹（封二），现存瑞安中学。另说：改名学计馆，是张之洞的主张。张氏在征得创办人同意后，“遂写‘学计馆’三大字横榜四、五幅”，以供选择。此说是否属实，录以待考。

学计馆聘请林调梅（和叔）当总教习（即馆长），年薪一百二十元。林氏是当地前辈算学家陈菊潭（润之）的得意门生，他上宗梅文鼎之学，旁通当代西方数理之义，是“当时号称精通格致”的算学专家。林氏在“课外复讲声光电化诸学，听者讶为奇矣。”盖非过誉。学计馆成立一周年，孙诒让手撰楹联（孙诒让书，刻木悬于会堂两楹），盛赞林调梅：

乡里有导师，亮节孤忠，历算专精祇余事。

洞渊昌邃学，通理博义，艰难宏济仗奇才。

可惜林氏因积劳成疾，不克始终其事。从一九〇〇年起，学计馆的领导职务，便由陈范（式颐，算学家陈菊潭的长子）代理。分教习二人，姓名均无可考，年薪各四十二元。

学计馆办了六年，先后招了多少学生，至今尚无史料可考。所谓“收纳学徒额数暂以三十名为准”，只是筹办初期的预想，不能据以确定在校学生的人数。现已认定的学生名单，只有金选簪、岑晴溪、陈宪、项宿仙、黄端卿、刘法道、王冰素、王伯舒、许介轩、黄养素、管幼竹、方瀛仙、宋干卿、郭啸吾等十四人。

学计馆的学生分甲、乙两班，每班每月上课各九天。课程以算学为主科，兼授理化；课外“还分发馆中所藏书报，令其轮流借阅，提出疑问，由馆长给以解答”。

开学后一个多月，孙诒让作《瑞安新开学计馆序》，并在上海强学会主办、梁启超主编的维新派喉舌《时务报》上发表。这是一篇具有全国影响的文章，摘录如下：

光绪乙未，东事甫定，中国贤士大夫始霁（jué 伤痛之意）然有国威未震之惧。于是京都及南洋，皆有强学书局之举。而瑞安同人，亦议于县城卓忠毅公祠，以教邑之子弟。皆以甄綜术艺，培养人才，寻厥涂洳，以应时需，意甚盛也。然人才之衰萃，艺学之不讲，朝野之间，岌焉有不可终日之虑，则人事或不能无过矣。瑞安偏小，介浙闽之间，僻处海滨，于天下形势不足为轻重；然储材兴学，以待国家之用，而出其绪余，以泽乡里，则凡践土食毛者，皆与有责焉，固不容以僻远而自废也。

学计馆之开，专治算学，以为致用之本。盖古者小学六艺之一端，而造乎其微，则步天、测地、剖器、治兵，厥用不穷。今西人所以挟其长以雄视五洲者，盖不外乎是。

——摘自《经微室遗文》卷四（手抄本，瑞安文物馆收藏）

一九〇二年，学计馆与方言馆合并，成立瑞安普通学堂。同年阴历正月二十日开学。这是按照清政府诏定学制而设的瑞安第一所官办普通中学，却已改变了原有专门学

校的性质。

学计馆的办学实绩及社会影响

学计馆修业三年的学生，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应用专业知识于实际工作的能力。当时，瑞安县志准备重修，全县地图的重新测绘，实为当务之急。这个任务便落在学计馆学生身上。经县志局选聘，部分优秀学生在总教习指导下，花了一年多时间，首次按新法完成了全县五十五都的测绘任务。

作为维新派思想阵地之一的强学会，在全国影响深远。各地有识之士，纷纷组织各种学会，从事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。学计馆的学生得风气之先，与馆外人士一起共十六人，“参泰西学会之意，以复兴中国固有畴人之盛业”（孙诒让），于一八九九年组织了瑞安天算学社，同年阴历三月八日正式成立。这个学社，便成为当地历史上第一个新式的学术团体。

学计馆的社会影响，最直接的莫过于乐清的算学馆。这是完全仿照学计馆于一八九九年办起来了。一八九七年，浙江巡抚廖寿丰在杭州创设求是中西书院（浙江大学前身），也曾参考了学计馆和方言馆的规章制度。杭州这所专授算学和外文的专门学校，其性质相当于把学计馆和方言馆合二为一的专门学校建制。至于思想方面的影响，则无法也无须裁量。

“桃李无言，下自成蹊。”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教育事业，包括学计馆，都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它的历史意义。

解放前的瑞安中学

王超六

（一）瑞中的沿革

瑞安中学创始于清光绪二十二年三月（1896年）所办的《瑞安学计馆》，迄今已历九十年了。历史悠久，目标宏大，毕业校友与在校学生人数历历甚多。在各个历史时期，在各个部门、各条战线上，在全国各个地方，甚至外国主要地域上，也都有瑞中校友的足迹，各起了一定的作用。在漫长的岁月中，瑞中的变迁，言其沿革，自有必要。“往事知多少”笔之如下：

甲、初创时期

（1）学计馆（1896——1901年）

学计馆创始于清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年），为瑞中的前身，也是我国最早的一批专门学校之一。那时清科举未废，学堂章程尚未颁布。学计馆之创办，站在时代的前列，开风气之先，这不能不归功于创始人的卓识。那年正是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的第二年。马关条约丧权辱国。一些爱国人士纷纷奋发图强，主张维新变法，兴办学校。邑人黄绍箕（仲弢）参加当时康有为、梁启超发起维新运动，所组织的《强学会》，积极在乡里办学。一代经师孙诒让（仲容）激于义愤，兴学图强，毅然发起建立算学书院。后改为《学计馆》，以区别于科举时代的书院。那时他们已认识到算学为科学之母，培养算学人才，重视自然科学教育。孙氏手撰学计馆对联：“质力弥纶，努力开拓新世界；物竞天择，回头科举老先生”。复手撰《瑞安新开学计馆叙》，刊布于上海强学会主办的《时务报》上，并手订章程十六则、学规二十六则，又在上海《算学报》上登载。当时杭州知府林启，创办《求是书院》，即浙大前身，亦曾向学计馆索取章程。

校址设在县前卓敬公祠（即今党校校址），因卓敬为我县宋明以来儒士之通算学者，以寓怀念前哲，启迪后昆之意。聘请当时算学专家林调梅（和叔）为馆长兼总教习，陈范（式赓）为代理总教习。林氏当时号称精通格致，课外复讲声光化电诸学，听者讶为奇谈。常课以外，还分发馆中所藏书报，轮流借阅，提出疑问，由馆长予以解答。学生姓名，就今记忆所及者，先后有金选箕、岑晴溪、许藩、陈宪、刘法道、黄端卿、王冰叔、王伯舒、黄养素、管幼竹、方瀛仙、项宿仙等。其中宋干卿最精于四则难题，后来学算学者，争聘为家庭教师。郭啸吾精于设计计算，称为土工程师。学计馆学生经过三年学习，对三角测量，已有门径。优秀者按新法测绘本县五十五都地图，已有成绩。学计馆经费由地方官绅捐助，总数二千余元，存典取息，以息金为教师修金。学计馆部分学生与馆外治算学人士，略仿上海算学会办法，组织《天算学社》，进行集体研究。当时曾订立社章十条。社址设在孙氏诒善祠塾，孙氏撰有《瑞安天算学社序》。

（2）方言馆（1897——1901年）

项湘藻（荅甫）家据巨资，奖掖后进，受新思潮的影响，于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年），创立《瑞安方言馆》。以学习西方科学风气既开，自须学习外文。所以称为方言馆者，以那时西洋各国以拉丁文为公用书面语，英、法、德等国国话的国际地位，远不如今日之高，故一个地方的语言，被称为方言。过去东亚各国如日本、朝鲜、安南等国书面，都惯用汉文言，故对日语也视为方言。稍后，广州也设立两广方言学堂。

校址设在范大桥项氏宗祠（即今城关二中校址），聘请上海蔡华卿，圣约翰大学毕业，为专任教师，月薪一百元，如此高薪，士绅咋舌。课程专修外文，兼修外国史地，学生初仅三十余人，后增为五十人，每生出资五十元。学生姓名就记忆所及者：项骧、郭仲宣、蒋咸平、项漱泉、项朴如等。项骧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后留美，蒋咸平、项漱泉、项朴如等均考入上海尚贤堂学习英语。

1901年温州基督教教会设《艺文学堂》，七月开学，开成立大会，孙诒让率学计、方言两馆部分师生参加。

学计、方言两馆办理有年，颇有成绩。清廷有广办学堂之动机，1901年，瑞安官绅即于冬间集议办法，决定将该两馆合并，更名为《瑞安普通学堂》。其经费除将学计馆原有基金拨充及学生收费外，又从宾兴及义渡二项收费，分拨成数作办学基金，瑞安有完全官办的学堂，实始于此。

（3）瑞安普通学堂（1902——1904年）

瑞安普通学堂成立于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，黄绍箕（仲弢）担任总理，黄绍弟（叔颂）付之。课程分为三班。

1、中文班：授以经、史、诸子、掌故、西政、格致、舆地等七门课，由教师口授，指定参考书目，不编讲义，令各生自行摘记。备有考问一簿，教师于授日常功课，保留二十分钟，将前日所课各门命题质难，当场令学生答案，缮于簿内，在退班之前须一一缴交。教师批改，凭记分数，每逢星期六作文一篇，一如家塾改卷之旧制，核定名次，揭示全班。教师为蔡逸仲（念萱）、蒋屏候（作藩）、杨志林（绍廉）、池仲麟（虬）等。

2、英文班：授以英文读本、会话、文法及世界史地，初习者用华英初阶、英文法程为课本。高级者以皇家读本、及英文汉语为课本，教师为上海蔡华卿，继为汪恒春、麟伯良。

3、算学班：初习者授以笔算数学，高级者授以代数备旨、数理精蕴、勾股三角测量、制图诸艺兼及物理、化学等书。教师为林和叔、陈式卿等。

创办人孙诒让还发起举办瑞安演说会，会址设在县学前明伦堂，每逢初一、十五，定期演讲，主讲者大多是瑞安普通学堂教师。

瑞安普通学堂附设书报经理处，代本县读者向沪杭等地订购新书与报刊。

孙氏鉴于当时大部分教师，多是科举出身的旧人士，缺乏新知识，并附设“师资读书社”。订有简章六条，并备有各教习无力购置的报刊，提供借阅。以普通学堂教习为基本社友，吸收其他学堂教习参加。

孙氏又鉴于普通学堂缺乏理化教师，派遣助教许藩（介轩）赴日本东京宏文学院入数理化专修科。订立合同，大致为（1）由堂内抽提常年入款墨银三百圆，作为游学之资。（2）须习理化科不得擅入别科，否则须赔偿第一期学费。（3）毕业后，须在本堂任教三年，不得别就他馆，亦不得中途托故辞退，可见孙氏识见远大，开了智力投资的先风。

校址仍在卓公祠，地方狭小，中堂作为礼堂，两厢辟作教室。办学经费全由地方自筹，由于学款支绌和多数学生要出国留学日本，于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决定办到年底为止，1905年停办了一年。

（乙）清廷颁布学制以后

（1）瑞安县公立中学堂（1906——1908年）

清廷校迫废除科举考试，颁布学制，兴办学校的风气大开。于是于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春，在“普通学堂”的基础上，恢复发展，改为“瑞安县公立中学堂”，校址由卓公祠迁到县学（即考棚，现为瑞安城关五小校址），地方人士推孙诒让为总

理，项崧（申甫）付之，蒋作藩（屏侯）为监督，当时依照部章定为五年制，分设五个班，共收学生百名。那时陈恺、许藩，已从日本毕业回来分任数理化教习。又仿日本中等学校设备标准，购置理化仪器五千余元，在校内开辟专室陈列。如此一套设备，在当时全省各府中学堂，是不多见的。

孙氏富于民族思想，晚年提倡科学，兴学图强。所聘教师不少来自全国各地，有的思想比较进步，倾向民族革命。如体育教师杜志行，湖北人，军校出身，教学认真，律己严人，对于学生的影响很大。现在有人记起，还念念不忘。听说武昌起义后，他亲自参加革命。在武汉附近一次战斗中，牺牲了宝贵的生命。又如历史教师洪绍琳，慈溪人，是光复会会员，在学校宣传民族革命思想。

（2）公立改为私立，私立恢复公立。（1908——1911年）

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，孙氏逝世，士绅陈骥宸（介石）等主张把学校停办，而项崧（申甫）主张续办，主存主废两派，形成“陈项党”之争。在社会上也形成了鸿沟。主要纠纷都归入陈、项两党，不入于“陈”，即入于“项”。不同主张的两派人士，在县明伦堂进行两次辩论，意见无法统一。乃由项申甫、苕甫兄弟捐款续办，将学校改为私立。校址迁到范大桥项氏宗祠，即原方言馆旧址。原“瑞安县立中学堂”改为高等小学，所置办的完备整套仪器，也不留作“瑞安私立中学堂”用，而为高等小学用。所以高等小学的仪器较后来的中学好。陈家以中学是项氏办的，其子弟宁可到温州去读，不到瑞安中学读书。那时由陈恺（勉卿）充任监督。旋陈去，由孙治泽（仲闾）继任，因第一届毕业生经省派员会考，成绩及格，恢复公立。

（丙）辛亥革命以后

（1）瑞安县立中学校（1912——1927年）

辛亥革命后，县议会将该校改为县立，定名为“瑞安县立中学校”，校址仍设卓公祠。1913年改为四年制，招生两个班，学生逐渐增至二百余人，校长自许藩（介轩）始。1925年学制变更，中学分为初中与高中，修业期限各为三年。原来中学旧制四年毕业后，考入大学预科，修业期限二年后，升入大学本科。中学四年、大学预科二年共计六年。今则初中三年，高中三年毕业即考入大学本科亦为六年。1925年，旧制四年与新制初中三年同时毕业。旧制四年毕业为末了的一届，新制初中三年毕业则为开始的一届，旧制结束后，则为瑞安初级中学校。

校长许藩于1911年就任，1916年辞，胡演元（幼玉）继任，演元于1926年辞，孙延锴（次镛）继任。延锴于1927年辞。

1927年北伐后，国民党执政，学校行政曾一度改为委员制，校长称委员长，胡旭（哲民）由原任教员中选任。旋仍称校长。

这一年，邑人王毓庭等曾创私立女子中学，校址设在屏星街林氏宗祠。第二年秋季，女中并入本校，开始招收女生。

（2）瑞安县立初级中学（1927——1942年）

1934年，胡旭辞职，那时规定，凡县立中学校长的任免，由县府推荐报省教育厅委任。地方一方士绅推荐胡泮熔（逊敏），另一方推荐赵熙（吕笙）为校长，均势之

下，县府未敢决定，刚巧那时浙江省教育厅长叶溯中，温州人，提倡职业教育，有意把瑞安县立初级中学改为“瑞安农业初级学校”。邑人王锡涛（伯川）适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，遂委任他为瑞安县立初级中学校长。他就任后，有意改为农校，聘请浙大农学院毕业同学郭枢（金茂奎）、孙祥复（杭州人）来校筹划。卒以顾全普通中学已有悠久的历史，又以社会贤达不赞成，改制之议遂寝。

校址卓公祠陈旧狭隘以学生增多，不敷容纳。先后建造“洋”式教室一座，楼上下各一教室，又建造洋式教室一座，楼上下各二教室。邑人北京大学教授林损（公铎）为之取名《勤思楼》，并作《勤思楼记》勒石纪念。

1939年春，校长王锡涛辞，以王毓榛（超六）继。由于学生人数激增，原有卓公祠校舍虽经添建教室，仍不敷于用，乃在过去西北镇之节孝祠（仓前街）西安宫、承安宫、天王寺等逐步扩充为分部。在这基础上，扩建教室一座四室，一座两室。1942年将邻近章氏宗祠基地与城基、火药局扩充为操场。

那时国民党政府对学校教育，漠不关心，教育经常费既很缺少，修缮建筑经费没有着落。解放前的瑞中校舍，简陋不堪，教室雨漏不加修理，自修室电灯灯光暗弱，不用功的学生借词不作业，用功的学生则叠桌架凳，以接近电灯勉可看书。夏间寝室床板臭虫丛生，不能安睡，乃卧在礼堂上、天井间，冬间教室窗门没有玻璃，寒风习习，只得忍熬。那时政府毫不理采，欲求改善，必须拱手作揖，乞怜于豪富之门，题缘托钵，求发其慈善之心，东募西捐，勉求应付。发起募捐兴学，办法有四：（1）向热心教育而富有者募捐，那时吴百亨捐助银圆二千元，王筱眉捐助银圆五百元，以此捐款建筑教室五个；（2）订印募捐册，分发在校学生分头募捐，每人凑数三十元，于学期开学注册时缴交，集腋成裘，勉襄盛举。（3）发动毕业校友捐募，如1929年己巳级毕业校友曹敬容、陈燊等发起捐募，建造己巳图书馆一座；（4）节约招生费用，以资挹注。1946年下半年，沈士奇任校长期内，建成教室一座。

解放前的瑞中，图书仪器贫乏可怜，图书廖廖可数。理化仪器求之示范，尚不可得，遑论分组实习。生物学显微镜教学用的，尚须向私人家借用。

那时省内中学分为省立、县立、私立三类，教师待遇一般以授课时数计算，授课时数越多，则待遇越高。省立的，每授课一时，高中一元五角至二元，初中一元至一元五角；县立的，高中八角，初中五角；私立的，视其经费情况决定，大概在省立与县立之间，有的名牌教师，“重金礼聘”者亦有之。县立中学教师的待遇，是较低的，聘请是较困难的。一般中学聘请教师，发出聘书，以一学期为约，到了学期结束时，如没有接到下学期的聘书，即作解聘论。有的，以一学年为约，但为数不多。

那时招生，每年分为春、秋两季。春季两个班，每班五十人。秋季三班，每班也五十人。班级分组，大致以城乡划分，乡区为一个班，城区为一个班或两个班。

由于事实的需要，1942年秋，国民党政府省教育厅批准成立高中。

（3）瑞安县立中学（1942—1949年）

抗战期间，各级学校纷纷搬迁，温属各中学亦多搬迁，同时从外地回来的在教学生又损多。为了适应需要，于1942年秋季开始办起高中，成一完全中学，教名为“瑞

安县立中学”。

先是，1941年“四·一九”事变，瑞城一度沦陷，校长辗转步行至大岙（今文成县）以谋复课。那时，大岙地方人士已成立“大岙战时初中补习学校”，因条件不合，未经省教育厅备案，乃将该校并入瑞中，定名为“瑞中大岙分部”。一方面便利大岙学生入学；一方面为瑞中抗战时期的后方。1942年“七、一三”事变，瑞城第二次沦陷，正在暑假期内，影响不大。

1944年秋，日本侵略军进犯温州。瑞安风声鹤唳，一日数惊，瑞城不能开学，乃迁至仙降区垟头地方常宁寺上学。是年冬“十二、一”事变，瑞城第三度沦陷，正当学期终末，停课温习，准备学期考试时，师生闻讯星散，学期考试暂停，俟下学期开学补考。经此事变，以如敌军进城，常宁寺仍不安全，乃以大岙分部为重点，把校本部迁至大岙，以策安全。为了顾全不去大岙而留城学生的读书，仍在城区部分开课，以城区为分部，以大岙分部为本部。

1945年春，“五·二六”事变，瑞城第四度沦陷。当敌来时，城区分部暂时解散。当敌去后，则仍上课。第一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典礼，也在城区举行，那时大岙本部则弦歌不辍。

抗战胜利后，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，发动内战。学生中进步分子在党的领导下，指引革命，进行反内战反饥饿斗争，革命思想、革命行动带动了一些中间分子。这些力量配合了社会上的革命力量，特别是校友中参加党组织的同志通过各种渠道，用各种方式进行革命，形成了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之势。

国民党的末期，那时校长虞执中秉承国民党县党魁的“钦旨”，尚作垂死的挣扎，在表面上看这个学校被搞得乌烟瘴气，实际上革命的形势已经成熟，只等解放的来临。

1949年5月10日欢声一响，瑞安解放了！瑞中师生欢欣鼓舞喜若狂，瑞中才走上了新生的光明大道。

校长王超六，四四年秋辞。国民党县长许学彬兼任，许学彬四五年秋辞，金嵘轩继。金嵘轩四六年秋辞，沈士奇继，沈士奇四七年辞，虞执中继。他是国民党政府最末了的一个校长。

解放前瑞中毕业学生自从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有记录以来，迄1949年7月计有3848人。其中，有自学成才的，如李笠字雁晴于1914年毕业，精研经史、善训诂、校勘、笺释、文字之学，以文字之交，受聘为温州师范学校教席。又以著作见重，被聘为中山大学教授，历任厦门、武汉、浙江、中州、之江、中央、南开、复旦等大学教授。郑闳达字剑西，1915年毕业，攻诗词，善书法，擅长琴、棋、书、画，时人称为才子。他的胡琴演奏，与梅大锁齐名，有北梅南郑之称。邹敬棣字梦禅，1924年毕业，即任职于浙江省图书馆，公暇，研究文字金石。对书法，真、草、隶、篆皆所精能。对治印，功力深厚，手法多样，能融名家之长，又能出己貌，内涵深邃。七十、八十年代，日本的《美篆》、《朱门》等刊物，曾专题介绍他的作品。

毕业后，考入大专院校，再如深造的，如1918年毕业的伍献文，是著名的鱼类专家，曾任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所长、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。如1916年毕业的曾省

(省之),是柑桔专家,曾任科学院柑桔研究所主任,在四川对柑桔栽培及改进方面,起了显著的作用。1924年毕业的缪天瑞,是著名的音乐理论家,著作甚多,现任天津艺术学院院长、全国历届人民代表、天津市政协副主席。1929年毕业的缪天荣,曾任中央、华西、齐鲁三大学联合医院眼科医师,发明眼科计算尺,对数视力表,现任温州医学院教授。1932年毕业的曾联松,设计五星红旗图案,人民日报、解放日报、文汇报、浙江日报、浙南日报、浙江青年都有报导,恕不能一一枚举。

(二)社会上政治转折与关键时刻的瑞中

瑞中有九十年的悠久历史,经历了朝代的更替,政府的变迁,对内对外的战争,各种的运动。瑞中为瑞安的最高学府,在这转折与关键的时刻,看看瑞中。

(1) 逊清与民国的交替

逊清时,瑞中称为“瑞安公立中学堂”。创办人与教师的思想是比较先进的,学生的思想也是比较先进的,所以武昌起义后,大都倾向民族革命。苏、浙、沪联军于辛亥(1911年)十一月初二日攻下南京,十七省代表齐集南京,成立临时参议院,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,组织临时政府,宣告民国成立,改用阳历,以当天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。通电到县,瑞中师生奔走相告,额手相庆,即准备庆祝,定于一月五日举行提灯大会。傍晚,各机关各团体人员从县前到司前,瑞中师生及高小师生从学前到集真祠前,向指定地点集合。六时许,从大街向西出发。前导是长丈余、用黄纱糊的、四周箍着红牙的大灯笼,上贴“庆祝中华民国成立提灯游行大会”红字,每人各高挑灯笼,上贴“民国万岁”红字,瑞中师生担任后殿具有维持秩序的意义。

民国成立后,瑞中改名为“瑞安县立中学校”,学制缩短为四年,课程方面,废除了《五经》。从《大学》“格物致知”取名的格致科,也改为理科了,每月朔望师生拜谒孔孟至圣先师之礼,也废除了。前清时期,有的教师对学生进行体罚,虽经禁止,但未完全禁绝。民元初,学生郭湘鸿被任课教师责打手心,以作教育的武器。家长向县署主管教育的第三科反映,经调查属实后,即由县署揭出牌示,对该教师公开申斥,并警告各校不得再有同样的事件发生。

(2) “五四”运动,1919年“五四”运动的浪潮冲击浙江以后,爱国学生闻风兴起。瑞中学生积极响应,集会声讨章宗祥、曹汝霖、陆宗輿等卖国贼,斗志激昂,精神振奋。斗争性较激烈的有:林刚(质中)、黄宗芭(芭荪)、林侠(超然)、金永高、王毓焜(佛陀)等,毕业生林熹(炜然)等。会后,游行示威,张贴标语,沿途高呼口号,气势磅礴,群众纷起响应,踊跃参加斗争行列。常在街头巷尾,如县前头、四角桥头、大码道、洞桥头等处,日则摇铃为号,夜则提灯笼为号,站在凳上,宣传爱国,揭露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,听看动容。

瑞中第八届毕业生(1915年)周蓬(予同)那时正在北高师(今北京师范大学)读书,亲身参加《火烧赵家楼》的斗争。他撰《火烧赵家楼》、《“五四”和“六三”》、《参加五四运动的片断回忆》等。分别登载报刊上。

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，瑞安籍一些在外地读书的学生组织“知行社”，宣扬新思想，设立“平民阅报所”供众阅览。周予同已从北师大毕业，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，并在上海大学执教，把进步刊物如《中国青年》、《学生杂志》、《民锋杂志》、《小说月报》、《学艺杂志》寄来，供众阅览。当时瑞中先进学生林去病（宝康）、黄德俊（得中）、胡准（鹰扬）、项顷（季千）、郭范（演九）等经常到阅报所阅读报刊，并组织“中山主义研究会”学习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，在小东门话桑楼（即飞云阁，现县药厂所在地）学习讨论，灌输了先进思想，奠定了革命的理论基础。他们分别加入共产党、国民党，有的是交叉的。

（3）北洋军阀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的交替

由于北洋军阀的混战频仍，民不聊生。又由于政治腐败，摇摇欲坠，于是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。在国、共第一次合作下，进行北伐。北伐军抵达瑞安后，瑞安人民夹道欢迎。国民党瑞安临时县党部由秘密转到公开。正式选举执委七人，推选林去病为常务委员，兼组织部长、郭范（演九）兼青年部长、林熹（炜然）兼商民部长，监察委员张贤（一帆）、项顷（季千）、秘书胡准（鹰扬）、干事陈明达等，都是瑞中毕业生。瑞安各群众团体纷纷成立。瑞中学生会也产生了。张士焱（忍之）同志担任学生会主席。由林去病主持，在城区四柏巷坦召开万人大会，瑞中學生纷纷参加。朝气蓬勃，气象万千。

瑞中的教师作了调整，那时还年轻的林大经（维猷）、李梦南、林永樾、周或甫、朱介夫、庾耀文、林兰熙等先后在瑞中任教师。课程方面，把“修身”课改为“党义”，国文课，原全是古文，间选语体文。

（4）“四·一二”——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

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几次著名斗争如白门秋收起义，仙降两次暴动，都有瑞中校友领导或参加。在这段时间，瑞中校友参加斗争，对瑞安和浙南的革命事业，作了不少贡献。

（5）“七·七”——抗战时期

由于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，国弱民贫，招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凯觎和侵略。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，在“西安事变”和平解决后，国共第二次合作，共同抗日。抗战军兴，全国沸腾。瑞中师生与社会上抗日团体配合下，特别是学生党员项景文、陈玉华、竺忠定、黄元龙等在党的领导下，积极响应，奋起抗战，做了一系列的工作；但在另一方面，也受到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歧视与阻挠。

宣传是对敌斗争的武器之一，也是学生的唯一武器。做了以下几项工作：

① 歌咏，在音乐教师侯家声、邹伯宗、华重本的指导下，在校中特别是集队时，高唱抗战歌曲，同仇敌愾，情绪奋发，歌声弥漫，斗志昂扬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。

② 口头、文字，学生组织宣传队，以竺忠定、余国良、洪卓如、叶苹、林景彦为积极分子，在教师率领下对外作口头与文字宣传抗日。在街头巷尾，在乡山区以愤怒的心情，斥责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，以充分的信心，坚持抗战到底；以历史的事实，激发民族自尊心。登台演说，张贴标语，并写标语。河口塘的桥梁石墩上，以土朱蚰灰写的

“抗战到底”的字样，下署“瑞安中学生宣传队”。经过风吹、日晒、雨淋，留下的痕迹，至今尚隐约可见。

此外，师生合作，刊印《新声半月刊》宣传抗日，随那时《瑞安新报》发行。其内容：有半月来时事汇述；有半月来战场分析；有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简史；还有英文《密勒氏评论报》的节译。

③ 各种各样的宣传，有剧目、有快板、有相声、有双簧、有口琴、有歌咏、有小提琴、二胡合奏等。还有话剧演出，如《布袋队》、《死亡线上》、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、《火坑》等。还有漫画、木刻，触目惊心，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。项景文通过音乐教师候家声组织《时代歌咏队》教唱抗日歌曲。候谱写了纪念“四·一九”歌曲。为了宣传抗日，纪念红五月，还秘密出版油印《熔炉》歌刊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。

在这段期间，在校学生竺忠定同志品学优良，为共产党吸收为党员。在党的培育下，益奋发前进，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，并在同学中介绍入党，发展党员。竟遭国民党县长吕律之忌。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寒假时，吕律责令学校当局把他退学。照学校章程，凡学生退学必须经过校务会议议决通过。开会时，发生争议，有的主张予以退学；有的反对，坚持不下。结果，以他旷课十六小时以上，依章予以退学。他被退学后，即奔投革命，站在革命的前列。一九四二年在平阳腾蛟被反动派逮捕。在百般利诱威胁下，坚定不移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活着是共产党员，死了是共产党的鬼。”从容就义前，高声呼喊：

“共产党是救国救民的好党，大家联合起来，打倒国民党反动派！革命一定成功！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现在革命已经成功，革命先烈们所流的鲜血，革命志士们前仆后继，所奋斗的光辉经历，永留史册，永垂不朽。

在抗战期间，瑞中第二十四届毕业生洪彦湜，飞行抗敌，在武汉光荣牺牲。

在这段期间，瑞中一些毕业生因找不到工作，彷徨徘徊，刚巧国民党中央军校在瑞招生，也以抗日相号召，他们遂去投考入校。解放后，他们起义后回来说：“我们也去抗日的，悔不到延安而到西安去了”。

在这段时间，第三十三届毕业生项文梅入平阳敖江临时中学，该校被迫停办，参加了新四军，经过艰苦的斗争，喜看解放之来临。

（6）“四·一九”

由于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，积极对共，坐使大半河山，沦于敌手。日本侵略军对瑞安屡作试探后，如入无人之境。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在瑞安登陆，瑞城第一度沦陷。当日本侵略军占据之日，瑞中校舍惨遭洗劫，图书仪器、门窗板壁，甚至桌椅板凳，荡然无存。因当时变起仓卒，时在深夜，城区居民在酣睡中惊醒，从被窝中逃跑出来，寄宿师生的被铺，亦被洗劫，无一幸存。所余者仅一空壳耳。日寇撤退后，全校师生化愤怒为力量，在极度困难情况下，迅速复课，渐复旧观。

（7）反饥饿反内战斗争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

抗战胜利后，由于国民党政府抢夺胜利的果实，发动内战，在全国声势浩大的反饥饿、反内战的斗争中，瑞中学生及毕业校友做了一系列的斗争。

一九四七年五月间，党上级组织通过温中学生安邦，与瑞中党员学生杨宗元、周

健、陈宪枢、谢盛培、戈尧勋等，发动反对学米的罢课风潮。那时，浙江省教育厅规定公立中学停收学米，私立中学得收每学生学米十五斤。瑞中系县立，本不应收而收。学生表示反对这违法征收的学米。学校当局向县府商量，县长许学彬召集学生代表、学生家长代表、教职员代表等三方面进行磋商。会议一开始，学生代表首先严词提出：“校长沈士奇不辞职，学米就无法解决。”于是斗争开始了。学生罢课，连续大约三星期之久，破坏了旧社会的秩序，打击了旧势力。结果，罢课风潮的积极分子不处理，校长沈士奇辞职。斗争胜利了。学校复课了。

瑞中毕业校友先后参加党组织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在不同的工作单位上，展开革命斗争。有的以小学校长的地位，城区教育会执委的名义，领发动了全城八所小学教员罢课、学生罢课，向县府教育科提出改善教工待遇，进行有利有节的斗争，迫使国民党政府全部接受要求，取得斗争的胜利，从而鼓舞了人们的斗志。有的以民众馆的名义，组织了一批社会青年，包括小教与中学生三十多人，成立读书会，传阅《展望》、《文萃》、《时代周刊》等进步刊物。召开时事座谈会，揭露和批判国民党倒行逆施的反动政策。有的与瑞中在校学生胡云棣、林树候、蔡作法等联系，建立“海燕”读书会，出会刊墙报，以及其他活动，团结广大同学，与“三青团”、特务分子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。

一些瑞中毕业学生张世楷、洪蕙如、钱旺珍、陈仲河等分别考入大专院校，在进步思想的熏陶下，于一九四八年暑期回瑞，组织“瑞安大联主办暑期补习班”，作为一个公开合法的活动。他们传播了新思潮，如读《大众哲学》、《历史唯物主义》、《共产党宣言》等。瑞中在校学生受其影响下，张贴壁报，油印刊物，虽受学校当局的严厉审查，还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的。

在全国革命形势高涨下，各地与各个革命组织，毕业校友与在校学生，更紧密地在党的周围配合起来，通过各种渠道奔向革命。有的，以外西南北（三港庙）小学为据点，有的以东南（所坦）小学为据点。联系一些同学与群众，进行革命行动。有的打进了国民党县党部作职员；有的，打进了东南日报作记者，参加瑞安县参议会大会；有的，打入军事科，当上稽征员；还有一些同志参加了城区支部与积极分子会议，讨论如何开展宣传，迎接瑞城解放。瑞中则成立了“护校委员会”，维持秩序，监视破坏活动。一些同志参加了中共城区工作委员会，与国民党军队代表进行谈判，争取起义。万事俱备，只等宣布解放了。

（8）解放

五月十日，瑞城解放了！人民政权诞生了！无数革命先烈、革命志士以及瑞中毕业校友与在校学生，抛头颅、洒热血，经过无数次艰苦曲折的斗争，终于胜利了。瑞中师生以及其他校师生与进步的市民一样，欣喜若狂。城内外锣鼓喧天，红旗如林，载歌载舞，欢庆解放！“解放区的天，是明朗的天！”歌声响彻云霄。

解放后，瑞中走上了新生、光明大道，蒸蒸日上，与日俱进。就校舍与设备言，巍然壮观。入其门，松柏花木，桃李芬芳。教学大楼，弦歌不辍。新建图书馆，富丽堂皇。科学大楼，设备周全，新式微电脑已由省厅拨给。这是解放前梦想不到的，也是解放后梦寐以求之，而今能成为事实。就在校学生人数与毕业后考入大专院校的人数，比之解放前若干倍。人才辈出，斐然可观。

笔者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，在瑞中旧制肄习四年。于一九三四年起，在瑞中任教员、教导主任、校长，校长辞职后，又任教员，于一九五一年秋调离。对解放前的瑞中，知之较详。解放以后，未作系统地全面了解，不敢记述。

艰辛的岁月 坚毅的奋斗

——抗战期间求学瑞中的回忆

蔡 瑞 庭

瑞安中学有着悠久的历史，走过曲折艰难的道路，最艰辛的岁月，莫过于抗战期间瑞城四次沦陷的那些日子了，学校遭到空前浩劫，师生过着非常动荡、困顿的生活。然而，艰难困苦却激起一股奋斗精神，学校得到空前发展，我那时在母校求学六年，也深受其熏陶。

一九四〇年秋我考入母校初中时，抗战已进入第三个年头，那年母校破天荒地招收初中新生三个班一百五十名。六年的学习期间，瑞安先后四次沦陷。在这接三连四的灾难中，学校累遭劫掠，腐败的政府不仅拨不出办学经费，甚至连教师的薪水也成问题。我们时常听到学校向政府索薪之声，就连我们这有限的几名“公费生”，每月政府应补助每人区区四十五斤大米也常拖欠拿不到。当时物价已经开始飞涨，学校只靠一点点学费自给自养，箇中窘况确非我们这些当学生的所能想象。然而，就在这内外交困的情况下，母校竟能挣扎支撑，自强不息。我考入母校时，全校只有初中九个班四百多同学，到四六年我毕业时，已发展成具有高初中十八个班八百多学生的庞大中学了。由于母校坚毅办学，得到社会和校友的支持捐资，校舍也比当初扩大了一倍。由于母校发展壮大，那时方圆百里中学仅此一所，莘莘学子由而得以跨入中学门槛，更使不少贫家子弟才有机会继续上进。当时学校当局擘划筹措，惨淡经营，全体师长员工群策群力，同舟共济，为延续民族文化，启迪后生才智，维系校运，造福桑梓，备尝艰辛，其功是值得纪念的。

母校的教学一向谨严，在那战火连天灾难重重的岁月，老师们仍然孜孜不倦认真教学。敌机频袭之时，老师们大都跟在我们后面疏散，警报解除以后我们常常踏着老师的脚印走进教室。学校流亡常宁寺期间，呼呼的西北风常常吹得老师们瑟瑟发抖，他们还是高声讲解不息，粉笔嗖嗖不停。那时战争伴着瘟疫，米珠薪桂，人人家事乱如麻，老师们仍以同学们的学业为重，很少请假。薛凝嵩先生教我班两长年初中国文，邵成萱先生教了一年半高中国文，几乎节节都到。我班初中植物、动物和高中生物都是洪特民先生

教的，每次钟声未打，他都早已在教室里等我们了。

那时学习断断续续，课时脱漏较多，老师们总是尽可能给我们补起来，力求使大家学得多一点好一点。我们这班在高中阶段就读了《四书》和《诸子》选读，唐宋诗词、魏晋及唐人小说以及六朝骈文等一系列课文，粗涉了中国古代典籍和文学的精华。那时国文老师教课与今天的有些不同，没有几个“环节”和许多思想分析，却十分讲究朗读。每课串讲以后，总是以传统方式高声朗诵一通，力图从抑扬顿挫的吟诵中，使同学们心领神会古人立意、谋篇、用词、遣句之妙。每当读到警句时，更是击节赞叹，用手凌空连连打圈，示意在课文上加圈。这种对古文的“朗读教学法”颇有启发感染之功，也有助于记忆，可借此音今天已成绝响。我班初中英语学得不好，听和说的能力很差。高一时来了一位洋纪椿老师，她是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不久。一来就唧哩哗啦讲了一节课，没有一句中国话，把大家都听傻了眼，个个凝神屏气呆坐在那里。第二节一提问，弄得她哭笑不得。这位老师劲头真大，从正音做起，自选教材，自刻讲义，教了国际音标又是英语绕口令，文选上了又是文法课，每节都叫同学们站起来或读或背，十分严厉。不久，大家居然都有长进，更激起了学英语的热情。后来虽然换了教师，到高三时程度好的同学也能啃起莎士比亚的大本头来，班里也出了好几期英文壁报，为全校英文壁报开了先河。六年中课程上得最完整的算是数学课了，老师们总是谆谆告诫我们：“学数学不能图轻松，更不能跳着走，否则自己害自己。”他们常是加班加点给我们补上因故失去的课时。在那个漫天烽火的年月，六年数学课竟没有脱漏一个章节。

我在母校读书时，也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一再掀起反共高潮，在浙南残酷剿共的血腥镇压时期。抗战初期的蓬勃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已被打下去了，我们入学后头一、二年高唱的抗战歌曲和偶尔演出的抗日救亡话剧连同“五四”以来的新文化、新思潮都日遭非议。然而，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，只能激起大家的愤慨，真理的火花也是扑灭不了的。有一次林炜然老师在“总理纪念周”上讲演，大骂那些孙中山先生的不肖之徒，恐日如恐虎，“公仆”成民贼。痛快淋漓地揭露他们的吹（牛）、拍（马）、揩（油）、敲（诈）伎俩，博得全校师生掌声雷动，发泄了压在心头的积愤。在那反动派叫嚣：“杀共产党宁错杀九十九，决不放过一个”的声中，教我们外国史的曾联松先生利用教绪论机会，关起教室大门，以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给我们上了一课社会发展史。有一次，他教完一节课后，突然在黑板上奋笔疾书《沁园春·雪》词一首，叫大家课后自己去赏析。大家暗中互传：“这是毛泽东写的”，大大开了眼界，引起了深思。曾老师的勇敢之举象是黑夜中的亮光，虽然只是一闪一闪，当时太黑暗了，显得分外光明。

在那一方面荒淫无耻，一方面是庄严工作的时代，母校老师和那些大刮民脂民膏，大发国难横财花天酒地的人相反，默默地忍受着重重灾难和折磨，辛勤教学，用心血哺育年青一代成长。他们无愧于中华民族的师德，为抗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，为母校生光增色。

当时同学们的学习称得起“苦读”二字，既要熬过战火的熏灼，又要忍受物质极端缺乏的苦楚。我们读初一时课本尚能买到，读初二时便只能向上班读过的借了，到了读

高中时借也借不到了。没有书，只靠刻腊纸誊印，学校里刻，老师动手刻，同学们也都自告奋勇日夜赶刻。讲义太多，连誊印也来不及，有些课程只好由老师边讲边在黑板上写，我们边听边记。簿册大都是自己用毛边纸订的，汗手稍放久一点就场了一片。钢笔、铅笔很难买到，铅笔削得象橄榄核那样还套在钢笔套里用。那时营养极差，同学大都面黄肌瘦，上午第三节时本来已是肌肠辘辘，加上大量笔记，手酸臂痛，到第四节大都头晕眼花，有点支持不住了。同学们家里装电灯的不多，煤油也买不到了，大都在灯盏里放一、二条灯芯照明。灯光如豆，凑得很近才能看清，常常把眉毛和头发燎去一片又一片，夜读名副其实地成了“燃眉之急”。尤其难堪的是，疟疾、疥疮盛行，染上一种脓包疥疮，又痒又痛又脏弄得坐立不安，即使治愈，还是瘰痕累累，宛如挂了一身“纪念章”。许多同学就在这些疾病折磨下只得休学。面对这些困难，同学们都深知困难当头学习机会来得不易，绝大多数都是“三更灯火五更鸡”拼命用功。

大家苦学苦读日夜盼望抗战胜利，憧憬着美好的日子。谁知庆祝抗日胜利的爆竹硝烟未散，内战的枪声又起。国民党政府加紧搜括，物价更如脱缰之马，一日之内连涨数次。四六年我们毕业考时，偌大的瑞安县城竟连吃饭的大米也买不到了，大街小巷响起了罢市拖曳洋油箱的隆隆声音。这隆隆之声正预告着一场伟大的风暴就要来临。通过毕业考试，我们这一班有二十四位同学毕业，而四〇年同时入学的一百五十名校友中，经过这兵连祸结的六年，现在只留下十二人了。这二十四名同学中家庭有条件到上海投考大学的有八个，一举考上七个，取得可喜的成绩。考不上大学的，当然避免不了“毕业即失业”的厄运。于是，大家又迈着艰难的步伐，迎着即将来临的风暴，走上新的征程。

我们在日机的隆隆声中进入母校，在罢市的隆隆声中离开母校。那日寇的隆隆之声，给我们带来深重的灾难，也激起了我们的斗志，我们就在高唱着“复兴民族为国争光”的校歌声中成长起来。这洋油箱的隆隆之声，已使我们听出这是广大人民忍无可忍的怒吼，是召唤我们这成长起来的一代，要为人民的幸福奋勇前进，再前进。我想，这就是我母校求学六年中，学到最宝贵的东西了。

一九八五年七月五日于温州教育学院

太平军进军瑞安史略

俞天舒

太平天国农民起义，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运动，它席卷江南诸省，曾经进军温州，大大震撼与动摇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。

清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初，太平军为支援金钱会起义，侍王李世贤派白承恩部